

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

第十二辑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

第十二辑

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

(昆明市环城北路)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

云南省新华书店代售

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

〔内部发行〕

云南省书刊出版登记证云出字第 079 号

定价：四角

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

第十二辑目录

- 一、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“欢迎欢送”（一）
 - 北伐战争回忆录……………梅 欣（1）
- 二、中共云南地下党在东陆大学学生中
开展工作情况……………满光宗（24）
- 三、回忆云南青年夏令团…………范立华 周芳莲（35）
- 四、建水建民中学……………汪潮清 汪涵清（42）
- 五、抗战时期大理中学的回忆片断…………李仲烈（55）
- 六、金平烽火……………王平曾（63）
- 七 记石屏地区的反蒋斗争
 - 关于宝秀中学和石屏支队的一些回忆……………杨相才（85）
 - 读者来信一束

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 “欢迎欢送”（一）

——北伐战争回忆录——

梅 欣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蒋介石叛变革命，大举屠杀共产党员。各地军阀，也纷纷用各种各样的残酷手段，发动反革命大屠杀。五月一日，朱培德在南昌宣布“迎送共产党”，响应蒋介石。一时传为奇闻。本文作者〔吴少默——编者注〕以亲身经历，追述这一历史事件真相。

一、讨伐杨、刘前驻粤滇军简况

滇军驻粤，开始于龙济光。“护国”军出川时，李烈钧、张开儒、方声涛曾率领滇军进入广东。以

后，由于唐继尧、顾品珍争夺云南政权的结果，杨希闵又率领顾品珍旧部来到广东。

他们在国内各派系军阀混战中，互相利用，曾经变换过不少**旗号**。同乡关系，同学关系，部属关系，对他们经常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。但对他们有切身关系的，还是个人和小集团的权利。他们相互之间，乃至他们内部各军、师、旅、团、营、连相互之间，为了扩大掠夺势力而拉兵、抢地盘，一直在进行着明争暗斗，以至武装冲突。龙济光失败后，驻粤滇军，经过李根源、张开儒之间的内鬭，以及杨希闵、胡恩舜、蒋光亮、杨如轩、杨池生之间的内鬭，势力各有消长。最后保留下来四个部份：1.盘踞以广州为中心的杨希闵部（以赵成梁、廖行超两军为主力）；2.与桂系勾结，进入广西，企图回云南争夺地盘的范石生部；3.投靠北洋军阀后，徘徊在赣南的杨如轩、杨池生部；4.局促于粤北乐昌的朱培德部。

朱培德原属随李烈钧出广东的滇军张开儒旧部。经过驻粤滇军内部几度争夺战后，投向孙中山，先后受编为大本营拱卫军。直辖第一军、建国第一军。曾随同孙中山去过赣南，驻过广州，后来受杨希闵所部压迫，退驻粤北乐昌地区。到讨伐杨、刘时，仅拥有一个师两个旅三个团的番号，师长为王均，旅长为顾德恒、张近德，团长为鄧孔芝、沈元镇、陈培根。全部实力不到三千人。

革命风暴起来了。一九二五年全国范围内，反对帝国主义、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浪潮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，日益高涨。而在广东，革命浪潮已形成一个有决定性的力量。这就不能不迫使滇军各个集团，要在革命风暴面前，抉择他们的趋向。军事实力较强，而又搜刮得巨额财富的杨希闵、范石生两个集团，则坚决与革命为敌。既缺兵，又缺枪，势衰力弱的朱培德集团，自然把讨伐杨、刘，看成是“东山再起”的绝好机会。自从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，革命力量与封建集团之间，经过长期的斗争，朱培德表示愿意靠拢，终于以滇军总司令的名义，编入讨伐杨、刘的战斗序列。

二、杨希闵集团溃败目击记

讨伐杨、刘的第一枪，开始于截击李宗黄（当时属于范石生的江防司令）企图驶往西江的军舰。从此即在广州市区周围，进行了七日七夜的战斗。这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。我们当时住在长堤泰安栈，完全处在杨希闵军控制的火线内。多数旅客都走了，还留住在栈房内的，仅有我们和韦梓旅部的一个军需官。每天特别是夜里，都有隔江的射击战。遇到枪炮声激烈时，这个军需官总是喃喃不休地在祷告：“天呵！滇军失败不得呀！”同时，也经常听见军人撞门和叫

骂声，但由于前后门都有坚固的铁栏木栅，他们没有进得来。战事结束的当天上午，栈房附近的枪炮声停止了，战斗转移到市中心。我们约同一位茶房，从栈房后门绕道维新路、西关到沙面对岸走了一趟。沿途遭遇过无数次市街追击战。溃败的士兵，把滇军的红边帽扔得满街都是。夹在士兵群中，有一些穿着袴绸短衫裤，臂上套着识别袖套的人，遇有机会，便撕下袖套，挤在行人中间从小巷溜走。进入沙面的铁门关了，门外挤满了溃败下来还没有被缴械的士兵，其中也有不少穿便服还戴着识别套的军官，他们在抱怨不能进入沙面，以致他们无法去搭洋船逃走。后来从他们中间的人了解，这些都是中下级军官，他们的裤腰上都缠裹着成百成千乃至成万的港票。战事发生后，他们都穿便衣指挥士兵，随时准备扔掉士兵逃跑。杨希闵和一些高级军官，早已逃到香港，很多营、连，还在战斗进行中，便已失去和上级的联系。从沙面对岸返来，市中心区的枪声，已经停止，沿途行人十分拥挤。一些曾经对广州市民犯过罪行的军官，虽然他们已经脱去了军服，但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，一个接一个地从各条马路的人群中间被指认出来。坐了车不给钱还要打人的，被车夫扭住了。被敲诈勒索过的受害人，遇见当日的强盗都不会轻易放过，又总是一群人一群人地围拢来，尽情发泄积愤。云南军阀的罪恶，在群众面前被清算的，要比在战场上受到的惩罚深刻

得多。回到栈房，知道那个军需官在战事刚停止时，便已溜上开往香港去的洋船了。

三、朱培德面临的三个问题

按照大本营的军事部署，歼灭杨希闵、刘振寰是有完全把握的。朱培德从小北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广州推进，但没有来得及参加战斗，广州的战事便结束了。他原指望在友军的压力下，和他与杨希闵所部的同乡关系，可以获得滇军全部或大部份的兵和枪，以及滇军原来驻防的若干地盘。而现在竟扑了一个空。

如果说，朱培德参加讨伐杨、刘，是出于接受了反帝、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号召，那是十足的撒谎。如果说，朱培德与孙中山历史上有过隶属关系，那也只是给他留下一个攀援机会；他对孙中山和孙中山的逝世，并没有任何政治感情。朱培德和其他大小封建军阀一样，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所追求的，就只是要扩充实力。朱培德此时最迫切的是：要兵、要枪、要地盘。

在广州被击溃的杨希闵主力，多数已被黄埔教导师所俘，其余一部份又为吴铁城、李福林所俘。朱培德到广州后，使用街招游行，收容了一小部份逃散的滇军官兵，而其中多数还是军官。原驻韶关的赵成梁部下韦杵旅的大部份，在战事开始前，为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所阻，无法调往广州（这对广州战事，在政治

上军事上都起了重要作用)。而谭延闿不顾事先与朱培德的协议，留给朱培德改编，竟突然把它全部包围缴了械。原驻连县附近的杨希闵部朱世贵师，由于孤悬粤北而平素又受歧视，接受了朱培德的收编，但全部只有千多人，枪械更为低劣。

朱培德从云南到广东后，跟着张开儒，李根源在广东打过战；跟着孙中山在广东、广西、江西打过战，而且吃过不少败战，武器早已陈旧，杂乱不堪。到讨伐杨、刘时，枪械只占兵数的七成左右，每连使用的都是几个种类。有几挺轻机关枪，还不够编足一个营。有几门小山炮，还不够编成一个连。朱培德的部队在广东，是有名的掺杂色枪的杂色军。

由于军阀割据形成的“防区”，是军阀们争夺的重要目标。杨希闵所属滇军，原来盘踞着广州、佛山、三水、韶关等富庶城市，他们把这些城市的一切财政收入，霸占在自己手里，特别是包赌包烟，收入更是可观。朱培德赶来，只有把司令部设在广州市区内，他的部队只能停在江村、芦包待命，垂涎已久的财赋防区，竟无法染指。

兵啊，枪啊，地盘啊，都不可能从战场上争到手了。

朱培德意识到当时广东的形势，革命的基本力量在黄埔，黄埔的力量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在于苏联的物质援助。于是他一再向大本营有关负责人特

别是向苏联顾问表白他忠于孙中山、忠于国民革命的“决心”。他向他们要求介绍政治工作人员到他的部队里。

四、一片“欢迎”声

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，朱培德在广州东山的公馆里，接待了大本营介绍来的四个云南籍青年。长时间的谈话后，他取出许多孙中山给他的亲笔书信和手令给他们观看，并且兴奋地说：“我这一生，从来没有像今天和你们谈话这样的痛快，以后一切都仰仗帮忙。”第二天，这四个青年从旅馆被邀请到停泊在大沙头的一只花艇上，作为朱培德的贵宾。经过协商后，工作先从筹备国民党军队特别党部开始。接着这几个青年以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名义，到部队驻地进行政治宣传，受到各驻地军官的特殊招待。营长以上的军官都分别出面举行宴会，有的甚至摆队接送。师、旅长以下的军官都站到行列里，听关于“五卅”、“六二三”反帝运动和三大政策的讲演。实际上，他们对国家大势并不感兴趣，在谈话中，只是不厌重复地叙述追随孙大元帅的经历，描述为大元帅作卫队和在大本营站岗哨的细节。主要想说明，他们拥护孙中山很早，与孙中山很亲近，因而功劳也很大，应该给他们的酬劳要很多。最后，他们都要求回到广州后，

替他们报告明白，他们太穷了，伙食钱，草鞋钱都发不出去。他们的兵太少，枪太少又太杂，要替他们解决。王均甚至说：“我的师部和一个团驻在江村，实力还大大赶不上本村的民团。”一个团长接着说：

“等政府的枪发下来，我们整队抬着一色新枪，在全村游行一次，看他们还敢小看我们不敢。”他们很强调滇军能打战，战斗力比粤军湘军强得多，而且滇军的乡土关系很重，云南兵留在其他部队里不合适，

“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逃到这里来了。”他们的“欢迎”意图是这样十分明确的。几个“代表”没有机会去深入了解士兵群众对政治宣传的反应，但在不多几天以后，英德驻地的士兵，为了反对剋扣兵饷，把师长朱世贵从司令部用草绳捆出街来，哄叫责骂，震动全城，士兵们挤去挤来，揪他的耳朵，拧他的鬍子。一个师部副官赶来排解，在傍晚时分，士兵看不清楚，以为是上次作政治宣传的代表又来了，大家都说，听“党代表”的话，放他回去。

五、国民革命军第三军

革命政府成立后，有关系的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。

朱培德在蒋介石、谭延闿、李济琛、李福林、程潜之间，被编为第三军。他个人已取得他所希望获得

的地位。按照改编计划，每军辖三个师九个团。蒋介石（以后为何应钦）的第一军和李济聚的第四军，都超过了编制员额。谭延闿的第二军，勉强可以照规定编起来。第三军应编为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三个师，从第十九到第二十七，九个团。而朱培德的底子是那么薄弱。初改编时，军官么，多得很，杨希闵旧部旅长曾万钟、韦杵等以下的各级军官佐，几乎全部无条件地又成为革命军人，而为朱培德所网罗了。他曾经搭起架子，王均任第七师长，朱世贵任第八师长、黄实任第九师长，并且摆起摊子，挂了牌子。但是，兵么，就大成问题了。经过多番活动，从被各军俘虏去的杨希闵旧部中，明讨暗拉，弄到一部份徒手兵，和他的班底全部凑拢来，还凑不足五个团。后来把原属赣军的李明扬部队拉到手，又从在小北江被打败的熊克武残部弄到一部份川军，这才勉强把七、八两师的六个团编凑起来，再搭了一个二十五团的架子，军部编了一个炮兵营，第七师编了一个轻机关枪营。至于第九师，依然挂着一块空招牌在等待新机会。驻地已调整到佛山、三水、四会、清远、英德等重要地方，但已不能掌握税收权了。

论实力，比起乐昌出发时，是扩充了。而在朱培德看来，这样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，怎么能够立足于、一、二、四等各军之间呢！

以共产党员朱克靖同志为主任的第三军政治部组

织起来了。在六个团部派出了党代表（国民党驻团代表）或政治指导员，每个营和师部特务连也派了政治指导员。政治工作人员中，多数都是青年学生，也有部份黄埔军校毕业生。其中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，有部份是云南的进步青年组织新滇社成员。由于当时广东政治形势的影响，朱培德对政治工作还抱着希望，希望政治工作人员替他抬着“革命”标号，希望政治工作能象黄埔一样对部队的战斗力起推进作用。因此，在政治部组织过程中，采取了听任态度，甚至可以说是**有礼貌的尊重态度**。但是，他还是塞进来一小部份为他所亲信而在他那里担任军佐的人。

六、政治工作怎样进行

朱培德这支队伍，是从滇军长期的历史传统发展起来，地方性极强，十分腐败的队伍。

当时的官、兵基本情况，

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，第三军的七个团长是：十九团曾万钟、二十团祝膏如、二十一团彭武扬、二十二团韦杵、二十三团万人敌、二十四团李思翹、二十五团甘芳。其中仅祝膏如一人与朱培德有直接关系，（后来祝和王均发生权利冲突，与万人敌对调）。曾、韦、万都是杨希闵旧部，李、彭属于赣军系统。营、连、排长中，只保留了少数几个为王均、朱世贵所亲

信的营长，其余都改由收留下来的杨希闵旧部担任了。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朱培德原日的部属而又直接带兵的，如鄧孔芝以下，多数都是行伍出身，他们目不识丁，没有学历，在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时，对朱培德已丧失了使用价值。朱世贵的情况更糟，原日的参谋长是一个政客兼商人，团、营、连长中，多数是长期跟随他驮运鸦片烟的马锅头，留用这班人，实在有些不成样子。至于所谓的杨希闵旧部，虽然在杨希闵极盛时期，对朱培德是那么趾高气扬，甚至欺侮过他。而在今天，他们又感激零涕地把朱培德当作唯一靠山了。赣军当时在广东，是实力很小的杂色部队，由于李烈钧和朱培德的历史因缘，曾经不断发生过关衷，现在双方都有新需求而结合起来，更是自然的。况且，李、彭两面的下级官佐，都安排上云南人了。

连、排长中，也有一小部份是青年学生出身的。他们在云南的中等学校毕业后，为了找出路跑到广东，接受了短期的军事训练，不久前刚刚穿上军服成为小军官，他们沾染军阀军队的恶习还不深，有朝气，也有求知欲。

士兵多数都是云南人。他们由于农村破产，被迫出来“吃粮”，有的还是被欺骗被捆绑拉出来的。他们在军阀部队里，受尽了黑暗专制的种种虐待。自从他们先后被带到广东以后，离家乡太远，而又处在地方排外性较强烈的环境中，连开小差的机会都丧失

了。大军官们利用了这个条件，恣意对士兵进行压榨，而自夸滇军的团结力量怎么大。事实上，士兵群众各种形式的闹饷斗争，在滇军中，一直是非常突出的问题。

再看看朱培德部队里的风气，

黑暗专制，绝对服从，是他们从军阀军队承袭下来的金科玉律。各级军官不论在什么场合，都把它当作教条，大言不惭地向下属训诫。他们以“头脑简单”互相标榜，他们认为军人一谈政治，军队就不好带，就不能打战。所以，他们不知道老百姓，也不知道国家。其实，他们的头脑并不简单。他们吸鸦片成风，赌钱成习，剋扣兵饷成性，殴打士兵成癖。在这类罪恶勾当上，他们挖空了心思，做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杨希闵所代表的滇军，作为一个实力集团，已经被彻底歼灭了，而滇军的幽灵，则为朱培德完整地保留下来。

云南的军阀，从来都是以贩卖鸦片烟为主要目的。过去他们出兵四川、贵州、广西、广东，不论打着什么旗号，重要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贩卖鸦片烟。他们所到之处，不论驻扎的时间久暂，不论收捐、作卖主、作雇客，都要与烟馆或烟商勾结。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，老样还是没有改变。自朱培德、王均、朱世贵以下的各级军官佐，很少没有烟瘾的。甚至传染了若干士兵。

军队里，从来没有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。士兵在上操吃饭以后，只有坐在营房里捉虱子。广东到处都有赌馆，大军官则藉以收保护捐，下级军官和士兵则把它当作唯一的消遣场所。每逢有饷可发或发点零用钱、草鞋钱时，赌馆里无有不挤满军人的。

由于烟、赌盛行，私卖枪械弹药及其他各种军用物品的事，也就随之盛行了。

广东统一后，军费军饷统一由政府发放，初步限制了驻军就当地征收捐税的现象。像朱培德这样积习较深的部队，哪里可能就那么规矩，依然层层剥蚀，无孔不入。军部师部，在军需物品的购置发放上做文章。团营营部，在浮领短发，大吃空额上做文章，甚至点名发饷时，还是派人冒名顶替。连长则凭藉司务长，在办伙食上大做文章。这些都是彰明较著的，甚至他们认为是当官人应享的权利。

至于士兵生活，那是十分悲惨的。他们吃得极坏，甚至吃不饱，赤脚走路，睡觉垫草，军毯军服好一点的被换走。病了无人管，到卫生队去，开的处方是一样，实际服用的是另一样。死了要剥去衣服，报了棺殓费而挖土坑掩埋。

不仅如此。他们经常发泄兽性使用毒刑拷打士兵，来维护军官的尊严和他们所谓的纪律。不论驻地怎样短暂，团、营、连部的两根军棍总是赫然在目。打军棍不打到皮绽肉开不止。一切狱吏使用的酷刑，

他们无有不使用的。并且常常是躺在鸦片烟床上，神不变色地指挥行刑。

这就是朱培德部队的大概轮廓。对朱培德说来，怎么适应当时的环境条件，把这样一个拼凑起来的摊子，稳定下来而又要成个样子，以便于他掌握，毕竟还是首要问题。

政治工作人员正式进入部队了。是按照政府颁布的条例，以部队的正式编制员额来到的。尽管还没有派来连的指导员，团、营长们，已经感到有些碍手碍脚，但是既然都是从军长那里来，那么，等着看吧。十九团团长，则在团指导员到后不多几天，便以军队将无法打战为理由，提请撤换派到他那里的团政治指导员。对士兵说来，到是一件新鲜事，也可能不过是增加一批新名目的官员而已。

工作终于还是进行。

政治宣传，以建立革命军队为要求，以打倒帝国主义、打倒封建军阀、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内容。每周每团集合一次，每营则在每晚点名时集合一次，向士兵讲话。对连、排长，则定期上政治课。

改进军风纪，改善士兵待遇，也列为工作的一部分。在多數的营、连里，司务长办理伙食，卫生队进行诊疗，都受到检查、劝告、督促，而有所改变。在听了政治讲话后，进赌馆烟馆的风气，逐渐减少或至